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全方位多領域互聯互通



議事論事

日前，筆者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出訪馬來西亞，出席香港駐吉隆坡經濟貿易辦事處開幕儀式，親眼見證香港與馬來西亞及東盟的經貿合作再上新階段。訪程期間，我們舉辦跨專業論壇，與當地政府、商界及專業人士深入交流，充分發揮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的角色。

「一帶一路」辦公室一直秉持統籌推進之責，持續深化基礎設施的「硬聯通」、規則標準的「軟聯通」，以及與共建國家人民之間的「心聯通」，從全方位、多領域推動香港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硬聯通」：主動對接項目 聯通國際市場

在「硬聯通」層面，「一帶一路」辦公室主動聯繫共建國家與地區的項目主管單位，逐步構建「項目合作平台」，積極發掘契機，讓香港企業及專業服務得以參與標誌性工程與「小而美」的民生項目。

我們亦持續組織外訪團，與各界別攜手共拓「一帶一路」商機。今年6月，行政長官率領商貿代表團訪問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推動香港全方位對接中亞經濟體系。此行成果斐然，共簽署96份合作協議與備忘錄，涉資逾16.5億美元。「一帶一路」辦公室亦與兩國關鍵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為後續協作奠下基礎。我們會鼓勵相關機關項目在香港進行路演，或發放資訊，助力本地企業精準對接商機。

與此同時，我們引進多項「一帶一路」旗艦活動落戶香港。例如，首度走出中東

的區域盛事——LEAP East國際科技與信息技術展，讓香港躍升為國際科技交流的新舞台。

「軟聯通」：搭建能力建設平台 促進規則對接

「軟聯通」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一帶一路」辦公室協調逾20個香港公營機構與學院，整合為香港「一帶一路」能力建設平台，為共建國家人士提供涵蓋交通物流、金融、法律、發展與工程、環境與生態、創新科技、醫療健康，以及廉潔治理等領域的培訓，藉此促進規則標準對接與民心相通。今年4月，辦公室舉辦平台交流會，進一步強化各機構協作，分享香港在專業服務與國際規則方面的豐富經驗。

「心聯通」：匯聚人才 促進文明互鑒

「心聯通」乃互聯互通之根本。我們積極構建共享的「一帶一路」人才庫，目前已有逾6000名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在香港就讀大學，當中約400人於2025年暑假有參與在港實習，為未來多邊合作儲備人才。

在文化層面，年度藝術盛事「亞藝無疆」每年9月至11月舉行，聚焦亞洲及「一帶一路」國家的多元文化。本屆藝術節匯聚逾30個國家與地區，策劃超過百場精彩活動，展現跨地域的藝術對話。與此同時，卡塔爾、埃及與烏茲別克斯坦亦相繼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辦文物展覽，使絲路文明於此交匯，促進文明互鑒。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年度盛會 共啟新征程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是香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經貿合作平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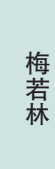
年第十屆論壇匯聚來自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200名與會者，前後促成的合作協議總值接近10億美元。

今年9月9日至10日，我們將舉辦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 共啟新征程」為主題，首設「出海」專章，聚焦中亞與中東市場機遇，以及低空經濟等領域；同時延續重點項目介紹環節，加強企業與項目之間的精準對接。誠摯邀請各界踴躍參與，共享「一帶一路」發展機遇。

展望未來，香港將繼續發揮內地與國際之間「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從「硬聯通」的項目落地，到「軟聯通」的規則銜接，再到「心聯通」的民心凝聚，香港正以務實行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獨特的香港力量。

「一帶一路」專員

外力攻擊香港司法反證黃之鋒之罪



新聞背後

正就「35+顛覆案」服刑的黃之鋒，早前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本案證據確鑿、案情清晰，最重要的是，連黃之鋒本人亦已認罪，按理說已經沒有任何爭辯的餘地。但偏偏仍有一班外國反華政客就此橫加指責，對案件扣上「政治打壓」等帽子。然而，與其說此舉是為「營救」黃之鋒，倒不如說進一步印證了此人過去與外國勢力緊密勾連的關係，更突顯了案件所涉罪行的嚴重性。

黃之鋒本因參與「違法初選」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今次所涉的則是與前「香港眾志」成員羅冠聰等人，多番與外國官員會面並游說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針對香港的法例，乞求外國對國家以及香港實施制裁、停止出口武器和裝備等，並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仍未停止相關行為，包括聯署要求外國終止向香港警務處供應法證軟件等。

罪證確鑿無可抵賴

兩案所涉不同的案情、不同的罪名，因此自然不存在黃之鋒已正在服刑，不可再受檢控一說。據控方在庭上透露，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雖然「香港眾志」宣布解散並停止運作，黃之鋒及羅冠聰亦宣布辭去相關職務。但黃之鋒此後在社交平台發帖，強調不會刪除舊帖文，更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亦不會放棄追求「國際線」，將繼續尋求「國際社會支持」。他還聲稱，香港需要有人繼續抗議，並向外國媒體講述香港情況以提升全球關注。

事實上，黃之鋒其後的確多次接受了外國媒體訪問，表示自己會留下來「戰鬥」，又撰寫多篇文章，提出「現在抗爭必須轉為地下化」、「本地和海外企業應以避免過度依賴中國，讓外國企業和政府擁有要求中國加強人權和自由保障的籌碼」

等觀點。幾乎在同一時間，羅冠聰則作為「國際線」的主要參與者，屢屢會見外國政客、出席海外聽證會，例如會見英國官員並建議英國政府對香港警方實施制裁，包括限制他們入境英國及凍結其在英國的資產；在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就香港國安法的所謂「不公指控」「作證」；以及致函美國、英國、瑞典和加拿大政府，要求其國內數碼法證公司終止與香港警務處合作，以避免其法證工具用以提取疑犯手機資料云云。而黃之鋒則一直分享羅冠聰帖文及聯署連結，甚至在2020年11月，還發表了一份所謂「判刑前工作報告」，紀錄自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進行的政治工作和相關「貢獻」。

大量證據累積到如斯程度，沒有任何歧義，亦不存在任何誤解，不管是黃之鋒本人的所言所行還是案情所涉的內容，都清楚表明他與羅冠聰等人長期串謀推動「國際線」，即使在國安法實施後，也沒有懸崖勒馬，表面上解散「香港眾志」，實質卻執迷不悟，公然宣稱不會放棄過往立場，還持續聯繫海外亂港分子，延續勾結外力亂港的惡行。黃之鋒現在認罪，也正正說明了他心知肚明，種種罪行已然容不得抵賴，根本沒有任何可供爭辯的合理理據。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辯方在求情時，表示與控罪相同的黎智英案相比，本案嚴重程度較輕，因此亦理應獲判較短刑期。但法庭反駁，判刑次序上應先決定本案是否「罪行重大」，才能跟黎智英案作正式比較，若本案情況確實較黎案為輕，則屆時再採取較低量刑起點。由此可見香港司法的嚴謹和專業水平，決不會簡單憑藉一時的感覺或印象作出判斷，而是綜合檢視案件的證據、考慮案件對社會造成的香港以至危害性，以及觀察被告是否確實存在深刻悔意後，再行衡量刑裁量權，讓本案得出一個合理而被社會廣泛接受的結果。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莫過於近日一班外國反華政客的拙劣表演。例如美國

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稱案件是「政治迫害」，過去被笑稱是黃之鋒「契媽」的前眾議院院長佩洛西，也加入稱這是「不公正起訴，是對權力的濫用」、「爭取自由並非犯罪」云云。

惺惺作態榨乾最後價值

只能說，外國勢力越大張旗鼓地為黃之鋒「喊冤」，要求特區政府「放人」，反倒越坐實黃之鋒勾結外國勢力的事實和罪名。更不要提佩洛西在美國國會山莊騷亂後，親自擔任調查委員會委員，並揚言要那些在國會內「爭取自由」的示威者付出代價。外國勢力對此案的反應，不過是又一假惺惺的政治表演，其最大目的，也只是要榨乾黃之鋒的最後一點利用價值，逃不掉被用完即棄的下場。

可能這些反華政客不太清楚，但本案法庭程序從拘捕、檢控、多次提訊，到交付高院、認罪、求情，歷時已超過一年，每個環節均嚴格按法定程序公開進行，整個程序合乎程序公義、公開透明，黃之鋒亦一直被保障能充分行使法律所保障的一切權利。試問，為何在這整整一年時間，這班政客幾乎一聲不吭，到黃之鋒日前認罪後又突然「如夢初醒」匆匆忙忙回應？就跟外國眾多「逃生艇」計劃變「沉船」一樣，關注是假，「抽水」才是真，對反華政客而言，黃之鋒還有多少利用價值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

本案無疑對香港社會發出了一個明確信息，任何亂港罪行，都必然逃不過法律制裁，同時各界更不能因亂港分子相繼落網就安然放下警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的圖謀並沒有隨之停止，在可見的未來也會接踵而來。站在香港即將公布首份五年規劃以及新一份施政報告的關鍵時刻，香港社會更要堅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最大底線，共同守護來之不易的寶貴發展局面，團結一致緊抓新時代機遇，推動香港邁向由治及興新征程。

成年人應當以身作則「身教」是保護兒童首要一步



新民政道

近日一宗商場內家長疑因子女使用遊樂設施時發生爭執，繼而大打出手的事件，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有關案件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三名涉案女子被控「在公眾地方打鬥」，其中一人因涉嫌襲擊女童，加控一項「普通襲擊」罪，三人獲准各以5000元保釋，案件押後至11月5日再訊。

在繁華喧鬧的都市生活中，商場、公園和社區公用設施，向來是市民大眾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的地方。然而，在這些人流稠密的公共空間，偶爾會因使用優先次序、排隊問題或孩子的嬉戲互動，引發成人或家長之間的口角甚至過激行為。每當看見這些在公眾地方爆發的衝突場面，特別是涉及幼童在場的情況，總是令人深感惋惜。兒童的成長環境對其一生有着至為深遠的影響。在公共空間發生的衝突，不僅是一次個人情緒的失控，更是反映社會在兒童保護、家庭素養教育以及心理健康防護上所面臨的共同課題。

助孩子保持心理健康

對於年幼的孩子而言，家庭與身邊的長輩是他們探索世界的安全堡壘，也是情緒的避風港。當這座堡壘的守護者在公眾場合情緒失控，甚至發生過激衝突，孩子內心的安全感會在瞬間遭到衝擊。保護兒童的涵義，並不限於防範身體上的傷害，更包含對孩子心理健康的保護。

當孩子目睹成年人的極端情緒或過激行為，會產生恐懼、焦慮與無助感。這種無形的心理創傷往往比身體的傷痕更難癒合，若未及時得到安撫與輔導，

甚至可能轉化為長期的心理壓力。因此，保護兒童的首要一步，就是為他們營造情緒穩定、具安全感的成長環境。

兒童的成長過程如同一面清澈的鏡子，隨時映照出周圍成年人的言行舉止。孩子主要透過觀察身邊最親近的長輩，來學習如何與他人交往、如何面對挫折，以及如何處理人際爭端。當成年人在衝突中展現出理性、克制與溝通的意願時，孩子學到的是解決問題的智慧與禮讓的涵養。反之，若成年人以衝動或強硬手段來應對紛爭，孩子便可能在潛移默化中誤以為過激行為是解決矛盾的有效途徑。這種扭曲的認知若在心中發芽，極易形成不良的情緒處理模式，甚至傳遞至下一代。家庭教育的精髓在於「身教」，唯有家長懂得管理自身情緒，才能教導孩子學會尊重、包容與自我克制。

完善社會支援系統

保護兒童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公共場所的言行規範，除了依賴道德自律與法律約束外，更需要完善的社會支援系統來保障兒童權益。當公眾地方出現人際摩擦或爭執時，社會各界都應具備保護兒童的敏銳度，及時介入調解，優先確保在場兒童的心理與人身安全。同時，亦需持續推廣正向家長教育，提供更多關於情緒管理與親子溝通的社區資源，協助父母在面對生活壓力時，能夠以更健康的方式紓緩情緒，避免將負面情緒帶給孩子。

兒童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應在充滿關愛的氛圍中健康成長。保護兒童，既是守護他們的當下，更是守護社會的未來。成年人應當以身作則，以理性與關愛，為下一代築起一道堅固的保護屏障，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和平、和諧與尊重的環境中自信成長。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中美戰略博弈的四大因素



國際觀察

2017年以來，中美從過去的競爭合作迅速演變成高強度的戰略博弈。但與此同時，雙方卻沒有重蹈二戰前的大國對抗模式，而是有邊界、可控，間隙還有穩定。特別是2026年雙方元首將有多達四次的高峰會晤。這一現象是由四大因素所決定的。

首先，中國是全球最接近美國實力的國家，雙方不僅經濟差距日益縮小，就是最先進的人工智能領域，中國也迎頭趕上。歷史上看，美國是絕不允許任何國家超越自己，也不接受在世界任何區域出現一個主導性國家。長期以來儘管西方輿論界一直唱衰，但美國決策層卻深信中國的崛起，不為所動。

其實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軍事戰略界和學術界最一流的代表人物都預測過這一點。法國現代最傑出的海軍戰略家海軍上將卡斯特（Castex）1955年發表《俄國，西方的堡壘》，不僅成功預見中蘇的分裂還預言中國的崛起及與西方的潛在競爭。英國二戰英雄蒙哥馬利將軍1960年和1961年中國最困難的時期兩度訪華後，在回憶錄《三大洲》預言：「五十年後，中

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1972年在和日本政治人物池田大作的對話錄中預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他甚至說：「如果再生為人，我願意生在中國」。

鬥而不破維持談判空間

隨著這些預言驚人的成為現實，中美的遏制與反遏制定性了雙方戰略博弈的關係。

其次，中美雙方都是核大國，這決定了雙方不會直接發生戰爭。雙方的博弈將主要體現在經貿、科技、人才、價值觀、盟友體系。這裏僅以貿易和科技戰為例。

2017年8月美國對中國啟動301調查，邁出貿易戰的第一步。2018年3月美國對中國鋼鐵加徵關稅，同時簽訂總統備忘錄，計劃對6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從此持續升級一路打到今天，並在2025年4月達到階段性頂峰：雙方關稅都超過100%，貿易關係形同徹底斷絕。

科技戰也始自2017年。當年12月美國率先在國防部禁用華為和中興產品並於2018年擴大到所有行政機構。2018年4月禁止向中興銷售芯片等元器件。2019年5月禁止華為5G設備在美國銷售並禁止向華

為等70多家企業出售相關技術和產品。2020年5月嚴格限制華為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6月正式將華為和中興列為國家安全威脅，8月全面切斷華為向非美企業採購芯片的途徑。2022年10月，全面限制中國獲取或製造高端芯片。2026年7月禁止在美國銷售任何含有華為等中企關鍵硬件設備。

這種博弈模式相對於核時代之前的一戰、二戰還是有很大不同。一是雙方鬥而不破，仍能維持基本的國家關係，依舊有談判、妥協甚至合作的空間。二是迫使各方都強化內功，解決自身問題並將此作為獲勝的主要手段之一。像美國要再工業化，中國則要突破尖端技術瓶頸。

另外，這種博弈還會有出人意料的效果。比如美國對芯片和人工智能的封鎖，無形中幫中國塑造了一個巨大的不對外開放的國內市場，這對資本密集型高科技產業來講，不僅消弭了外部強大的競爭風險還保有高收益確定性，從而刺激了這一產業的進步。美國的封鎖反而使雙方的差距加速縮小。

第三，相對歐洲，中美是有濃厚現實主義精神的兩個國家，能夠理性的、不拘泥於形式和禮儀、從國家利益角度處理雙

方的競爭。而且從雙方關係破冰的過程來看，都極具智慧。

1969年1月一向以反共著稱的尼克松總統發表就職演說。在中美嚴重對立的背景下，向中國發出了含蓄的信號：任何民族無論人口大小都不會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毛澤東主席隨即極其罕見的決定在《人民日報》全文刊發。同年更發生美國駐波蘭大使上演「華沙夜奔」：在時裝展覽會上追逐中國外交官，邊跑邊喊美國總統要與中國恢復會談。他接到尼克松的指示甚至是：「即使迫到廁所也在所不惜。」幾天之後，美國外交人員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應邀進入中國大使館。後來中美聯手打出的乒乓外交更是經典中的經典。

建立對抗和妥協的平衡點

放到今天，中美能從空前的貿易戰迅速走向休戰，雙方領導人舉行系列峰會都是這種現實主義和智慧體現。和歐洲不戰、不和、不走、不降相比，中美行動迅速，調整快捷，能夠非常快的找到穩定的利益平衡點。這背後的理性邏輯是：美國要防範的不僅僅是中國，和中國對抗的利益折損點在於它不能失去壓服住其他大國的能力。至於中國則盡力避免和美

國的對抗升級，以確保即將實現的民族復興。

第四，歷史上看，美國不管遇到什麼威脅或者對手，往往很難集中精力於一點，面對中國時也是如此。冷戰時，歐洲是美蘇博弈的主戰場，但它卻一再把主要力量投放到亞洲。比如美國三分之一的陸軍、二分之一的海軍和五分之一的空軍力量都被拖在朝鮮戰爭，每個月消耗量都相當於對北約援助的一倍半。

美國自2010年即開始亞太轉移，但力量卻一再被「阿拉伯之春」、中東亂局、俄烏衝突所牽制。到了特朗普時期，無論是貿易戰還是軍事行動，更是在全球大打出手。美國力量的分散不僅減輕了中國的壓力，也無形中提升了中國的應對能力和應對時間。

以上就是理解今天中美關係的四大因素：美國不接受中國的崛起確定了雙方的戰略博弈關係。核時代和雙方的現實主義使得能迅速建立起對抗的邊界和妥協的平衡點。美國的力量分散也影響了雙方的博弈強度。最終則是中國在美國的大力遏制下仍然保持了整體的發展勢頭。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